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视角下公众应急响应行为预测模型

摘要: [目的/意义]本文以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在各地反复出现疫情反弹的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以风险感知为视角,探讨了不同用户在不同风险感知维度下做出的应急响应行为,构建公众应急响应模型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方法/过程]对用户从如性别、学历等人口特征变量和疫情中信息流、风险感知和响应行为变量进行可操作性定义,用李克特量表设计问卷,发放、回收、清洗数据后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 相关性检验、Kolmogorov-Smirnov 单样本检验等 SPSS 分析操作及进行火眼金睛可视化。[结果/结论]①相比于官方信息,关注非官方信息人群的风险感知程度更高,更倾向于关注诸如新增感染人数等负面信息,且该人群更关注生命健康风险。②信息的接收程度对风险感知的判断有很大的相关性,二者均会影响决策行为,风险感知对行为的影响权重更大。③风险感知程度越高的人群越容易引发消极心理,部分公众会做出消极行为但大部分公众仍会配合防疫工作开展,积极响应。

关键词: 风险感知; 响应行为; 疫情; 突发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 Risk perception

perspective of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behavior prediction model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epidemic, earthquake and fire and other sudden and frequent public health ev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mergency response behavior of different users under different risk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perception, constructs the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model and proposes solutions. [Method/process] Users were defined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background, source variables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risk perception variables and response behavior variables. Likert scale was used to design questionnair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Kolmogorov-Smirnov single sample test, ANOVA and fire eye visu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after data release, recovery and cleaning. [Results/Conclusions] ① Compared with official information, people who pay attention to non-official information have a higher risk perception,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nega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number of newly infected peopl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life and health risks.②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reception has a great correlation with the judgment of risk perception. Both of them affec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nd risk perception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behavior. ③The higher the risk perception i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lead to negative psychology. Part of the public will engage in negative behaviors,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public will still cooperate with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and respond positively.

Keywords: Risk perception; response behavior; outbreaks; emergencies

0. 引言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为“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社会公共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包括有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或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对事件的预警和应急早在 2003 年中国爆发 SARS 疫情后就有大量且系统的研究，其中就有关于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的研究^[2]。

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都受到波及，尽管在国内，疫情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抗疫过程中，我国受到了惨痛代价，即使在 2022 年，疫情仍在各地有反弹，同时在防控疫情中暴露出许多可以继续优化的问题：包括防控决策和管理部门横向联动的灵活性不足^[3]、医疗体系漏洞、社会信息混乱等^[4-8]。这些宏观上存在的问题，具体到公众身上可能诱发新的问题与矛盾，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顺利推进。超市哄抢食物、风险区居民擅离隔离区等现象，都是由公众所接收的信息及其心理风险感知诱发的。

综上，本小组从疫情中公众角色出发，聚焦社会信息的流动，从公众的风险感知视角，试图通过探究社会信息特征在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下，如何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的配合，以此构建公众应急响应模型，以期分析公共突发事件下公众心理及行为变化，提出对社会信息的规范的建议，协助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和效益。

1. 文献综述

1.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流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体系中,信息流是指从事件现场到决策系统中情报信息的传播路径^[9],通过信息在信息流中高效高质地流动,决策层可以全面而具体地了解现场情况,从而快速做出反应,以降低事件的损失。针对新冠疫情期间信息流的传播,冯子健^[10]等提出了建立突发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对及时发现和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子^[11]认为信息情感色彩会导致公众心理危机,进而影响公众的心理与行为;张翼鹏^[12]提出误导信息对受众的负向情感比重高,在误导信息中,负面情感的信息转发传播次数多,受众参与程度更高;王菲妍^[13]等认为公众信息需求与信息及时性呈正相关等。

基于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信息流用信息来源、信息色彩、信息时效性来衡量,从群众接收信息出发,了解公众在选择性接收不同信息后的风险感知情况和心理变化与行为反应,探索三者之间的规律,帮助政府防疫做出建议。

1.2. 风险感知

突发事件中的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突发事件的感受和认知,其侧重点在于人们对负面结果的可能性进行的主观估计。它的影响因素是极其广泛复杂的,包含如个体差异、知识经验、认知偏差等主观因素和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的类别、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等客观因素。控度的感知可以减少焦虑情绪产生的可能性。甄瑞^[14]等提出,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和性质、疫情风险感知是疫情防控当下民众焦虑出现的重要因素;Wineman^[15]认为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的方向及后果严重性是不确定的,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风险感知会使民众的心理压力升高、消极情绪增多,对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LIBERMAN^[16]等研究认为风险感知的偏差大小取决于建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是人对某事物接近或远离参照点时产生的一种主观经验;LIU^[17]等指出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和焦虑情绪;李希光^[18]等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公众风险感知存在的差异性;章燕^[19]等认为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域的公众对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等。

表 1 风险感知研究进展

作者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研究结果
甄瑞 ^[14]	自陈式问卷	疫情防控下的民众焦虑的产生因素	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和性质、疫情风险感知是因素。

LIU ^[17]	随机抽样 回归分析	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感知 的影响因素	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个体特征和焦虑情绪。
李希光 ^[18] 等	问卷调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 初期公众健康信息采用 意向	受众对疫情风险的知晓到重视 存在严重滞后现象。
章燕 ^[19] 等	量化研究	公众风险感知、风险传 播行为特点，疫情严重 程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	疫情严重程度对公众的风险感 知和传播行为的调节作用部分 被证实。
孙俐丽 ^[26]	扎根理论 度访谈微 博主题讨 论	重大事件情境下公众风 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	建立了以信息源、信息内容、信 息用户、政府应急表现等为核 心的公众风险信息感知影响因素 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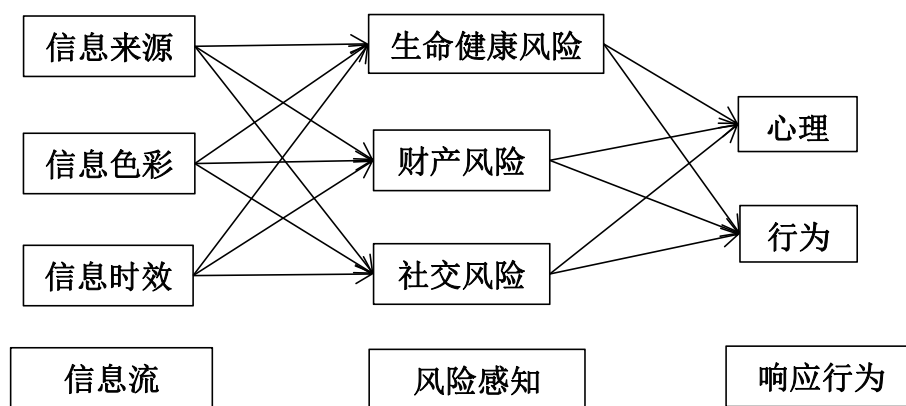
1.3 响应行为

应急动员是否被响应是一种“可被测量的个体差异”，影响要素为“险情、对于突发事件的经验、应急状态下的焦虑和应急准备”^[20]。胡丁月^[21]研究提出了新冠疫情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心理状态；昌敬惠^[22]认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与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呈现出高相关度；王欣^[23]等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民众面对疫情的恐慌情绪对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极化作用；民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越高，则会显著降低其应对行为；王平^[24]等认为个体在特殊情境下的健康信息行为受到政策和信息源的影响，从而会影响响应行为；胡峰、温志强^[25]提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行为响应和处置取决于信息情报的支持。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基于孙俐丽^[26]提出的公众风险信息感知影响因素模型，结合王子^[13]、张翼鹏、马敬东^[14]等人的信息流因素，本文探讨在不同信息的接受程度下，在不同的风险感知视角下，公众的应急响应行为预测情况，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具体而言，本文将信息流分为信息来源、信息色彩、信息时效性，预分析其对公众风险感知及响应行为的影响情况；同时将风险划分为生命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社交风险；响应行为分为心理和行为，分别探究信息流对风险感知与风险感知对响应行为的相关性。

图 1 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对于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流和风险感知及风险感知对响应行为情况，我们提出以下的假设：

- H1：信息来源与公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有相关关系。
- H2：信息色彩与公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有负向相关关系。
- H3：信息时效性与公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有相关关系。
- H4：信息来源对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行为具有相关关系。
- H5：信息色彩对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行为具有相关关系。
- H6：信息时效性对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行为具有相关关系。
- H7：生命健康风险影响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的积极性。
- H8：财产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的积极性。
- H9：社交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疫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响应。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调研和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调查问卷采取问卷星线上发放的形式，问卷设置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所处地域总计五个人口特征变量。对于信息流、风险感知及行为响应变量，进行了可操作性定义，分别以李克特量表形式进行测量信息接收程度、风险感知程度及具体行为响应。考虑到问题解读不明的情况，我们将信息特征和不同维度的风险感知放入到具体场景中，从而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 相关性检验、ANOVA

分析等验证其相关性。变量阐述如表 2 所示。信息来源是指公众接受的信息在发布时是否经过官方认证；信息色彩是指疫情信息描述中的正面或负面信息，负面信息如每日新增感染、死亡人数，新增风险地区等，而每日治愈人数，抗疫阶段性成果，疫苗研发等则属于正向信息；信息时效性是指公众接收信息时更愿意选择关注长远信息如疫情的整体感染率及死亡率情况还是关注近期发生的信息，如某地疫情反弹等。在风险感知层面，生命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社交风险分别是衡量公众对疫情的感染率、后遗症等感知情况对财产和社交关系的风险程度如何。响应行为分为心理和行动，心理层面如产生紧张、恐慌等心理情绪，行为则有拒绝或配合政府抗疫政策两种行为。

表 2 变量阐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阐释
自变量	信息流	信息来源	发布信息是否经过官方认证
		信息色彩	信息隐含的情感色彩
		信息时效性	接收最新疫情动态的能力
因变量	风险感知	生命健康风险	对生命健康的威胁
		财产风险	疫情中财产损失
		社交风险	社交回避及行程信息泄露等
	行为响应	心理	对疫情事件的主观想法感受
		行为	疫情下具体做法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经检验，问卷 Cronbach.a 系数为 0.840，存在信度。问卷共计回收 215 份，清洗后取有效问卷 204 份。作答的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3。对于调查问卷，调查之时处于中高风险区的人数有 15.69%。从信息流看，信息来源平均值 2.1，说明官方信息值远高于非官方信息；信息色彩相差不大；但时效性关注较高，平均值 4.39，说明公众更普遍于关注官方信息。在风险感知层面，生命健康风险的关注度更高，平均值 13.16，社交风险和财产风险类似。在响应行为方面，其行为响应数值为 12.98，看出在疫情中采取积极行为如主动配合防疫政策、自愿参加防疫工作的人偏多，同时消极心理的均值为 7.74，看出在疫情中易产生消息心理配合隔离的人数也存在不少。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N = 204)

变量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dev.)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偏度 (Skewness)
性别	1.58	0.495	2	1	-3.2
学历	3.54	1	5	1	-1.522
角色	4.86	0.579	6	3	-1.059
信息来源	2.1	2	4	-2	-2.91
正向情感	3.94	1.041	5	1	-0.894
负面情感	3.39	1.344	5	1	-0.487
信息时效性	4.39	0.745	5	1	-1.647
生命健康风险	2.67	3.415	16	-5	0.233
财产风险	8.41	3.065	15	3	-0.26
社交风险	9.25	2.889	15	3	-0.265
消极心理	7.74	3.015	15	3	0.28
行为响应	12.98	2.631	8	-1	-0.798

4.2. 相关性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信息流到风险感知相关性结果如表 4 所示，风险感知到响应行为相关性结果如表 5 所示。

(一) 信息源

在信息来源方面，更关注官方媒体发布信息的群众认为接种疫苗后不会轻易感染结果显著($r=0.29, p<0.01$)。更关注非官方媒体发布信息的群众认为一旦感染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产生后遗症结果显著($r=0.19, p<0.05$)。

在信息色彩方面，关注正向情感信息（如新增治愈人数、接触隔离人数等）的公众认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会轻易感染($r=0.18, p<0.05$)，而关注负向情感色彩信息(如疫情后遗症、全球化疫情感染等)的公众则认为一旦感染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产生后遗症($r=0.26, p<0.01$)，与生命健康风险关系显著。

在时效性方面，关注最新发生信息的群众（指新增确诊人数，新增中高风险地区数量等，最新的感染或治愈信息）认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r=0.16, p<0.05$)，认为此次疫情远未结束，随时会面临感染的风险($r=0.30, p<0.05$)。从财产风险来看，关注非官方媒体与风险感知中财产风险关系显著($r=0.29, p<0.01$)。从社交风险来看，更关注非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认为影响较大($r=0.21, p<0.01$)。

（二）风险感知三维度

在健康风险内部,认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的群众与认为此次疫情远未结束,随时会面临感染的风险显著相关($r=0.32, p<0.01$),相反,认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会轻易感染与不会轻易感染显著相关($r=0.35, p<0.01$)。在财产风险和社交风险的内部,二者都是三者均显著相关,都是使财产或者社交关系受到不好的影响影响。

（三）行为响应

从心理层面来看,认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如内心恐慌、焦虑($r=0.39, p<0.01$),减少与朋友交流的兴趣等($r=0.18, p<0.01$),财产风险与社交风险均与其产生显著相关($p<0.01$),因疫情产生的钱财的损失和社交关系与心理行为的负面影响较大。

在行为层面内部,萎靡不振、废寝难安,尝试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与减少与亲朋好友的交流,进行自我孤立显著相关($r=0.74, p<0.01$),而积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与积极参加社区防疫服务显著正相关($r=0.68, p<0.01$),财产风险会产生负向的行为,如吸烟喝酒等($r=0.31, p<0.01$)。

从行为层面侧向看,认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产生负面行为($r=0.29, p<0.01$),与社交风险关系显著($r=0.28, p<0.01$)。而认为接种疫苗后不会轻易感染与积极行为相关联,与会积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如:居家隔离,勤做核酸、戴口罩等)($r=0.26, p<0.01$),会积极参加社区防疫服务显著正相关($r=0.34, p<0.01$),认为我国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会轻易感染的人群会更加参加产生积极行为,如配合政府防疫工作($r=0.24, p<0.01$),积极参加社区疫情服务($r=0.29, p<0.01$)。

健康风险与关注疫情负面情感信息无显著相关关系,健康风险中认为接种疫苗后不会轻易感染与心理负向暗示也无显著相关关系。财产风险、社交风险均与关注官方信息,疫情正向信息、信息时效性无显著相关关系。

由于部分变量相关性高于 0.600,本文进行共线性诊断。当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VIF)小于 10 时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范围^[27]。如表 6 所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皆远小于 10,消除了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信息流到风险感知相关性(N=204)

变量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官方媒体	-0.026	.489**	.246**	0.085	.235**	.549**	.234**	.165*	.265**	-0.063	-0.025
2. 非官方媒体	1	.859**	.138*	.262**	.315**	-0.012	.259**	.212**	.312**	.328**	.330**
3. 官方性		1	.247**	.272**	.395**	.271**	.346**	.269**	.408**	.254**	.275**
4. 正面情感			1	-.143*	.538**	.396**	.174*	.302**	.310**	0.103	0.078
5. 负面情感				1	.757**	.175*	.195**	0.131	.217**	.219**	.224**
6. 色彩性					1	.411**	.281**	.311**	.389**	.254**	.242**
7. 时效性						1	.145*	.253**	.259**	-0.088	0.054
8. 生命健康不严重性							1	.147*	.782**	0.088	.162*
9. 生命健康严重性								1	.732**	.426**	.362**
10. 生命健康风险									1	.329**	.340**
11. 财产风险										1	.589**
12. 社交风险											1

注: *: $p < 0.05$; **: $p < 0.01$; 未标注即为不显著。

表 5 风险感知到响应行为相关性 (N=204)

变量	2	3	4	5	6	7	8	9
1. 生命健康不严重	.147*	.782**	0.088	.162*	.206**	.269**	.278**	.407**
2. 生命健康严重性	1	.732**	.426**	.362**	.339**	.398**	.157*	.447**
3. 生命健康风险		1	.329**	.340**	.356**	.436**	.290**	.562**
4. 财产风险			1	.589**	.557**	.399**	-.140*	.269**
5. 社交风险				1	.662**	.403**	-0.123	.282**
6. 消极心理					1	.583**	-.150*	.425**
7. 消极行为						1	-.140*	.800**
8. 积极行为							1	.481**
9. 行为响应								1

注: *: $p < 0.05$; **: $p < 0.01$; 未标注即为不显著。

表 6 多重共线性诊断

变量	方差膨胀系数	变量	方差膨胀系数
学历	1.045	信息时效性	1.210
官方信息	1.177	生命健康风险	1.246
非官方信息	1.149	财产风险	1.031
正向色彩信息	1.096	社交风险	1.269
负向色彩信息	1.037	消极心理	1.112

4.3. 回归分析

在相关性分析基础上, 进行线性回归 (Linear Regression) 分析, 信息流到风险感知相关性结果如图 1 所示, 信息流及风险感知到响应行为相关性结果如表 8 所示。对于生命健康风险, 信息来源的三因素对其影响显著, 而仅信息来源对财产风险负向影响显著 ($\beta = -0.305, p < 0.01$), 信息来源是否是官方性信息对社交风险也是显著负相关 ($\beta = -0.326, p < 0.01$), 因此, H1 成立, H2, H3 不成立。而信息来源到行为响应显著负影响 ($\beta = -0.276, p < 0.001$), 信息色彩到响应行为显著正相关 ($\beta = 0.121, p < 0.05$), 信息时效性到响应行为则不相关, 因此, H4, H5 成立, H6 不成立。对于响应行为信息流中的信息来源 ($\beta = 0.331, p < 0.001$) 信息色彩 ($\beta = -0.276, p < 0.001$) 与其显著相关, 而信息时效与响应行为显著不相关。而生命健康风险与响应行为显著相关, 风险感知三因素与消极心理均显著相关,

而财产风险与社交风险对疫情防控积极行为显著不相关。但社交风险与消极行为显著正相关 ($\beta=0.174, p<0.05$)，故 H7 成立，H8 不成立，H9 部分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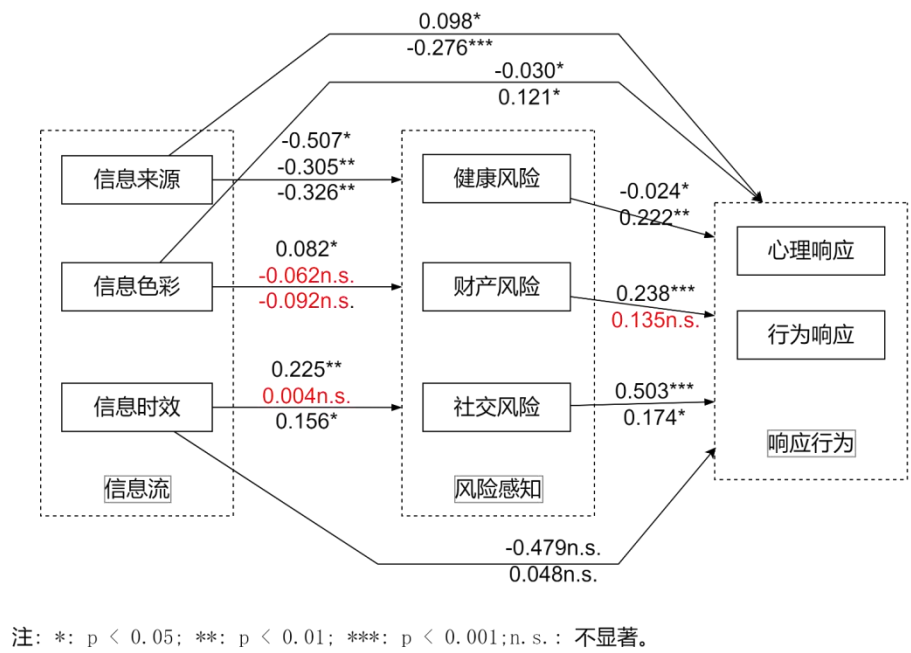


图 1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5.讨论

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公众接受到的信息会显著影响用户对疫情事件的风险感知程度，进而会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态度和行动。其中，信息来源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相比于关注官方信息的公众，关注非官方信息的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更高，这可能是由于非官方信息的误导信息较多，未经官方认证，虚假夸大的成分更多，公众对其的反应程度更剧烈导致；信息色彩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负面信息相比于正面信息更能引发公众的风险感知，这可能是因为负面信息往往都与风险直接联系，比如疫情越严重，影响范围越大，普通人被感染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造成健康和财产等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信息时效性方面，大多数公众更愿意关注最新的信息，并且相比于关注非最新消息的公众来说，关注最新消息的用户的风险感知程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越新的消息就越能激发用户的不确定性感知，从而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而影响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也会显著影响公众对疫情事件和防疫的态度，感知生命健康风险的程度越严重，产生消极心理（失眠，焦虑等）、做出消极行为（逃避隔离等）

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大部分情况仍会服从社区防疫安排。对于财产风险和人际社交风险来说，公众的感知程度越高，其表现消极心理和做出消极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出现拒绝防疫安排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相比于健康风险感知，财产和人际关系的损失更可能使公众做出扰乱防疫秩序的行为。

根据以上调研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对疫情相关信息的管控力度。监督各平台对发送的信息严加审核，杜绝不实消息、恐慌消息的发布，更多发布诸如疫情好转等正面消息，激励公众，让公众对抗击疫情的胜利充满信心，促使公众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工作。由于公众更愿意相信官方的信息，所以官方媒体更要承担起责任，发布最为真实可靠的疫情消息，同时也要对不实消息进行及时辟谣。要传导信心。要统筹网上网下、大事小事，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要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视、生动报道各地各部门的防控措施；要深入防控一线，宣传报道一线人员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宣传报道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要有组织地宣传报道康复患者的有关情况，用防控成效、治疗效果引导民众增强信心。要做好疏导，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实施分类干预、分类援助，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要发挥“健康中国”APP、“12320”卫生热线及各种健康平台、各个协会、各个学校、各个公益性组织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27]，为民众提供全天候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援助服务。

（2）实时更新疫情动态信息，管控非官方信息、虚假恶意造谣信息的传播。在当下全国抗疫的阶段，公众对于疫情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更新的信息使得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疫情的最新动向，包括新增人数以及新患者的动向轨迹等，在安抚公众心情的同时也可以及时地组织公众进行全面的预防措施^[42]，使得公众在面对未知的风险时也不会感到过度的慌张。

（3）对公众做好健康教育，完善其对疫情认知。疫情发生以来，各种信息铺天盖地。打开手机、连上网络，映入眼帘的都是疫情信息。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由于各种信息真假莫辨^[28]，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政府应加强对公众的健康教育，使公众了解新冠肺炎的相关防控知识，如此，降低公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感，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使之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4）对因疫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予以一定的补贴。如对因疫情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误，政府和施工单位协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与建设单位协商，合理顺延合同工期。停工期间或工期延误增加的费用，发承包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协商处理。因疫情防控发生的防疫费用，可计入工程造价。因疫情造成的人工、建材价格上涨等成本，承包双方应加强协商沟通，按照合同约定的调价方法调整合同价款。地方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主动作为，加强对复工复产保障政策的解读、细化和落实，向企业宣传好、解释好、落实好政策，支持企业依法享受税收、成本、金融、保险等优惠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对材料、设备等供应短缺，影响工程复工复产的，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真正让企业得到实惠、受到激励，更加坚定复工复产信心。

（5）做好人文关怀，防止公众因疫情隔离或行程数据暴露产生的孤独感。从这一点出发，鼓励公众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和家人或者邻居交流情感，同时避免网络人肉、网络暴力的产生，尽量保护用户行程数据信息。

6. 结语

本文以风险感知视角下公众应急响应行为为出发点，研究在不同信息流、不同风险感知中的公众行为预测，可以看到，①非官方信息会对公众产生更大的风险感知及心理压力，因而从信息源出发，要控制非官方的虚假信息的传播。②信息的正负向色彩也会极大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及行为，要控制信息情感的方向性。③更大的风险感知会带来心理及行为的改变，存在风险感知会对公众防疫进行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当风险感知过于强烈时，公众会产生不良心理及行为，如紧张、愤怒或封闭自我等，因而正确认识风险对突发公共事件有很大的影响。④尽管存在较大的风险感知和负面心理，但绝大部分公众仍会配合防疫工作开展，志愿参加防疫工作，积极响应。

本文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关于研究对象。基于接触范围有限，未能收集到医护人员及科研人员问卷数据，故本文结果更能代表普通公众，未来研究可扩大对作答领域、问卷数量的获取，使结果更具有普遍性规律；第二，关于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调查和问卷调查，样本数量有限，且基于作者处理水平有限，回归分析及可视化分析还有待精进，未来将继续学习。

参考文献：

- [1]谭晓东,陈小青,王凤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控制概述[J].中国公共卫生, 2003(08):9-11.
- [2]甄尚敏,孟友侯,延文等.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体系》的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3(02):96-97.
- [3]杨巧云,姚乐野.协同联动应急决策情报体系:内涵与路径[J].情报科学, 2016, 34(02):27-31.
- [4]郭雪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应对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16-27.
- [5]罗琳,曾晓进,廖欣等.新冠肺炎疫情期公众疾病认知、应对方式及锻炼行为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 2020,36(02):156-159.
- [6]魏华,李廷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不同人群心理的影响及心理干预的建议[J].儿科药学杂志,2020,26(04):6-7.
- [7]姜长云,姜惠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检视[J].管理世界, 2020,36(8):8-18, 31.
- [8]姚宏武,索继江,杜明梅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医院感染防控难点与对策[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20,30(6):806-810.
- [9]姚乐野,范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报本征机理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23):6-11.
- [10]冯子健,李克莉,倪大新等.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及时性的研究[J].疾病控制杂志,2008,12(2):152-155.
- [11]王子.公众心理危机长效干预机制的构建——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思考[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20(5):43-48.
- [12]张翼鹏,马敬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误导信息受众情感分析及传播特征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0,4(12):45-54.
- [13]王菲妍,曹韵秋,肖安琪,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网民的信息需求主题关联及情境因素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1,33(5):28-39.
- [14]甄瑞,周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J].应用心理学,2020,26(2):99-107.
- [15]Wineman,N.M.(1990).Adaptation to Multiple Sclerosis: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Function Disability and Perceived Uncertainty.Nursing Research,39(5):294-299.
- [16]LIBERMAN N,TROPE Y.The psychology of transcending the here and now[J].Science,2008,322(5905): 1201-1205.
- [17]LIU M,ZHANG H,HUANG H.Media exposure to COVID-19 information,risk perception,social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and self-rated anxiety in China[J].BMC Public Health,2020,20(1): 1649-1657.
- [18]李希光,苏婧,文三妹.公众在重大疫情暴发初期的风险感知差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信息采用的影响机制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0,7(3):130—151.

- [19]章燕,邱凌峰,刘安琪等.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兼论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J].新闻大学,2020,40(3):31—45.
- [20]DICKEBOHMANN A K,COX C B.Predicting successful responses to emergencies: the emergency responsiveness scale[J].Current Psychology,2017,36(2): 209-216.
- [21]胡丁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心理调研及对策建议——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青春岁月,2021:374-376.
- [22]昌敬惠,袁愈新,王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20,40(2):171-176.
- [23]王欣,肖春曲,朱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民众恐慌情绪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10):1445-1449.
- [24]王平,孙明伟,安琪.个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行为——以 2020 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的质性观察、探讨与启示[J].图书馆,2020:92-100.
- [25]胡峰,温志强.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情报生成机理及效能提升策略研究——基于融知发酵模型[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4):38-47.
- [26]孙俐丽,巫超.突发重大事件中公众风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8):38—43.
- [27]丁依霞.政务小程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OL].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2:1-6
- [28]汪伟全,赖天.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83-93+112.
- [29]苏新宁,蒋勋.情报体系在应急事件中的作用与价值——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图书与情报,2020(01):6-14.